

序跋精粹

一、初邂逅金庸

时光飞驰，转眼今年已是金庸一百年。而那我三十岁时写的《读金庸偶得》，竟也过了四十二年！

六十年代中期，我就看过《天龙八部》。那是某一位跑船的长辈从香港带回来的。读后极为惊艳，但并不知道作者金庸是何许人也。

七十年代，台湾的租书店有《萍踪侠影录》《小白龙》等书名，据说也是金庸所著，只是被冠以别的名与用了别的作者之名。

看过了好几部他的著作，加上自己从十多岁已到了二十多岁，早多了更丰富的审美功力；那时即认定这位金庸，是众多武侠小说家里写得最好的！

二、沈登恩引进台湾

一九八一年六月，我刚退伍没几天，在台北衡阳路巧遇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他说他费了很大的工夫，终于使金庸的著作解禁了，终于要引进金庸的书在台湾正式出版了。

不久，我就接下了这本《读金庸偶得》写作工作。犹记沈登恩当年爱说：“《红楼梦》此书如此脍炙人口，所以有‘红学’；金庸也该有‘金庸学’！”

这就是说我的他的“大胆的盘算”。我写得慢，等我半年后交稿时，倪匡已出了《三看金庸小说》。所以我是“金庸研究”丛书中的第四本。

有眼尖的读者会问：“你书中似乎没提《碧血剑》？”我说：“好问题。乃八十年代最早的远景版，没出《碧血剑》。它还没解禁。”

这就像当时《射雕英雄传》是改成“大漠英雄传”的书名，才过关的。另外《书剑恩仇录》也改成《书剑江山》，皆是当年的一些规避之举。

这书交出后不久，我就被“国泰建业广告公司”（即“奥美广告”的前身）的协理宋秩铭拉去他公司做一个“文案”（copywriter）。

说来真奇怪，从那以后，所有的武侠小说皆未曾拾起。多年后又出了个女作家，据云写得极好，叫郑丰的，我亦没看过。

就像打麻将，九十年代初以后，人都过了四十，就再也无意打了。也像戒烟，我到了五十岁，一不抽，就再也不抽了。

也像摇滚乐，七十年代末以后，已慢慢不往下追了。举例言，史汀（Sting）就没怎么听。性手枪（Sex Pistols）等团就没去听了。

而鲍勃·迪伦（Bob Dylan）的Blood on the Tracks和Desire二张唱片后，他的唱片便再也没听了。

这是什么？这是每人在生命岁月中的各种兴趣与关注自然会出现的停歇与转移。

我和许多大我一些、小我一些的同辈会看武侠小说，当然和我们共拥的时代有关。就像五、六岁起会蹲在地上打弹珠、玩圆牌，七、八岁起若说阅读就已看起了漫画书（叶宏甲的四郎真真是那时闯进了我们的视野）。

他们似乎是作家。读武侠的人也有读武侠人的共同气。就像我们说，吃牛肉面的人有那种吃牛肉面者的调调一样。

而这一切，于三十四十年代出生的人言，最是明显。请言其详。古龙生于一九三八年，柳残阳生于一九四一年，他们的年代是国家很多难又很动荡的年代；人的气息、人的情感皆呈现这种不安与愤慨。

许多人提笔写武侠，常是中学生。中学生，或说少年，是“武侠情怀”最热烈的人生阶段！

柳残阳曾说他高中生写武侠的稿酬，比他父亲校级军官的饷还丰厚！刘兆玄他们三兄弟写武侠，也在做学生之时。《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和他哥哥在少年之时，也写武侠。

四、我和武侠小说，竟皆是那时代的产物

这说的是“不怎么花钱的娱乐”（小说出于租书店，花费甚少）。观看电影，则是“花钱的娱乐”。

五、武侠小说在那年月幽幽衔接了某种飘渺的老中国

五十、六十年代，坊间的武侠小说，是大陆来台湾的人写的小说。写的内容，皆是发生在古代，在远方的中国。

稍微年长的，有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等。稍微年轻的、后起的，有古龙、柳残阳、上官鼎等。稍微更老的，则有孙玉鑫。再更老的，有郎红浣。稍后加入的本省作家，如田歌、秦红，算是少有的例子。

他们都是台湾写的。我们看的皆是成于台湾之作。金庸写于香港，我们当年在台看不到。

至于早期成于大陆的《十二金钱镖》（白羽）、《卧虎藏龙》（王度庐）等，有很长一段岁月此间也是看不到的。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亦不是人人看得到的（哪怕此书的名气恹大，提谈此书的人恹多）。

其实郎红浣（1897—1969）的年纪大于王度庐、郑证因，然在大陆时未必是写武侠之人——也就是说，若非寄居台岛，他可能不会提笔写武侠呢！

不知是武侠小说这种类型太过老中国、太过撩人乡愁，抑是它和太多人童年的旧梦有不可切割的渊源，太多的学术型文人也不免提笔颇富兴致地来写它一写。据说，书画大师江兆申（1925—1996，后来担任“故宫”副院长）

近日在整理尘封几十年的父亲遗存书信时，发现了三封署名为查良鏞，即金庸的亲笔信，其中两封信披露了一些他进入报界之前以及父亲介绍他入职东南日报的细节，印证了他们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

金庸的第一封信写于1946年6月30日，挂号寄往上海狄思威路《东南日报》报馆：

向平先生：接获来书，欣慰不已，把晤匪遥，良可喜也。弟至内地后，曾考取联大、中大、政校诸校，以政校费用较省，故在该校之外交系就读三年，去岁因应考译员而休学，曾在重庆与诸友人创一大太平洋出版社，办一个太平洋杂志（由弟任编辑），虽只出了三期，现在看看也

颇幼稚，只是当时大家情绪好，倒也很开心。现在很想到新闻界来服务，未知能加入贵报工作否，可否请先生鼎力介绍。职位待遇在所不计，最好是内勤的，因为白天还有利用多读点书，政校弟不想再去复学，政治空气太浓厚的地方读起书来太没味。如果贵报不可能，可否在沪、杭、京等地之报馆代为设法。如有端绪，弟即来沪奉访，兼便接洽，请即示复。

乡居无聊，在继续翻译袖珍牛津字典，及大仲马的一本小书，虽然吃力不讨好，亦聊以自遣耳。即祝

弟 良鏞谨上 六、三十 示教处：沪杭路 硃石 袁花镇 鼎兴酱园转

虽然金庸被派为外勤，但进入报社工作对他是一个重大的人生转折，而五年前在《东南日报》发表处女作的风华少年，此时竟已成为父亲的报社同仁。

重温父亲老人们的这段回忆，再细读当年金庸给父亲的这两封信和历经沧桑的《东南日报》副刊作者地址簿，感慨万千，欣慰莫名。

忆那些逝去的武侠年月

舒国治

五十年代还在基隆教书时，也曾化名写过短时间武侠呢！

六、年少莽撞，常是武侠创作的动机

武侠作家有武侠作家的某种气质。就我的观察，尤其以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来说，他不妨有一股民国气。甚至更好是有民国的太保气。乃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原本就弥漫在社会上的一大片“不平气”。

我生在那种时代，如今回想，就会最珍惜那种如今再也见不着的带点破落感、东西皆缝缝补补、社会总弥漫着一袭江湖飘摇的气氛。

好比说，你去看看古龙，或看柳残阳，他们似乎很像写武侠的人！他们看待身边的太保或类太保，有他们很感亲近又很通透的眼光。并且，他们自己不用是太保。哪怕他们在生命中某一段困厄、不快、委屈的岁月就差一点要往那条上走了。但他们终究不是。

他们是作家。读武侠的人也有读武侠人的共同气。就像我们说，吃牛肉面的人有那种吃牛肉面者的调调一样。

而这一切，于三十四十年代出生的人言，最是明显。请言其详。古龙生于一九三八年，柳残阳生于一九四一年，他们的年代是国家很多难又很动荡的年代；人的气息、人的情感皆呈现这种不安与愤慨。

许多人提笔写武侠，常是中学生。中学生，或说少年，是“武侠情怀”最热烈的人生阶段！

柳残阳曾说他高中生写武侠的稿酬，比他父亲校级军官的饷还丰厚！刘兆玄他们三兄弟写武侠，也在做学生之时。《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和他哥哥在少年之时，也写武侠。

故我几十年后每谈武侠，更爱把五六十年代的台北桀骜学生与他们托身的强恕中学、文山中学，与牛肉面之兴起等等相叙并论。乃那更是“后民国”极强烈的生活与美学。乃这是台湾这八十年最珍贵的瑰宝也。

七、台湾那年代，是武侠最相宜又最相配的时地

武侠小说不但有读它最相配最贴切的年代（像台湾的五六十年代），也有最相配最贴切的环境。

像当年台湾的城镇——像彰化的溪



州、员林、台南的新营，当然新竹市、花蓮市也是。其实台北、高雄这些大一些的城市又何尝不是？

像当年的房舍——战后匆匆盖出的民国式瓦房。加上日本房子的木造结构。街上有骑楼的排屋。更有眷村的紧凑型房舍（你今日去看一眼“中兴新村”便知我意思也）。

像社区结构——稻田边的小小租书铺子。巷弄一条来一条去的墙后人家，与墙后传来的麻将声。

像印刷方式与纸质——要用毛糙的纸张，印成松松的排字，装订成薄薄的一本一本，一部书往往达三四四十册。出版社常是南瑛、真善美、四维、春秋等等。

这些都是埋头读武侠最理所当然的环境啊！当然，如今只能缅怀啊。

八、高妙作品之首的浅俗作品，你由于年少或时代清贫，反而舍不得啊

武侠小说出了金庸，固是最终极之



作；自此别的作品皆被比过去了，皆不值一晒矣。就像鲍勃·迪伦如此高妙的词与歌曲手听过，别的流行歌手、低眉写词作曲者便不值一晒也，然真是如此吗？

有时你偶忆起在迪伦之前，当年你已听得很喜之 A Place in the Sun (Stevie Wonder), Susie Q (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 If You Go Away (Rod McKuen), 甚至冲浪吉他曲 Walk, Don't Run (The Ventures), Pipe Line (The Chantays), 哪怕显得通俗、不够高眉，你照样今日听来极是兴奋欢愉，并不被迪伦雄风掩盖。甚至那首动物合唱团 (The Animals) 唱的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你至今听的仍是他们一九六四年唱的版本。即使动物合唱团主唱早宣称他们学得此曲是听了一九六二年迪伦第一张唱片中这歌的民谣原曲，不久就改唱成如今的“摇滚版”！

然而几十年来坊间听的，全是动物合唱团唱的 House of the Rising Sun。乃它是太多太多人生命中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全身心反应。

你相不相信，这首歌初降台湾，我和我的同辈固然听到，比我年长的古龙、柳残阳也必然听到了。我没问过林怀民，但我相信他当年绝对听过！

那些歌曲初次降临到地球上，不久我们在偏远的台湾就听到（跟在菲律宾、在泰国、在日本同样听到），是那个战后的时代原本使然。

还有一个人，也绝对听过，并且爱不释手，就是搬演、创作布袋戏的黄俊雄。

这就像即使读金庸之士今日偶掀开昔年很迷之田歌、陈青云、柳残阳、卧龙生等未必臻于高峰、稍嫌通俗之作品，照样乐趣横生，甚至忆起了少年时台湾那年月青涩粗陋的生活氛围啊！

好了，我要回头看看我自己了。嗟乎，我糊里糊涂过了童年、少年，又很粗陋荒疏地以那些弥散在身边的粗糙文艺材料娱乐自己、养育自己……然后在三十岁时，停下了武侠的阅读……接着仍然糊里糊涂在人生中漂泊……啥事也看不上，率性而吃，率性而睡，一意孤行，一事无成，亦不想成，只偶在自己那胡意又无文的手艺上似作琢磨……一天一天往下混着，竟然又过了四十多年，转眼已是七旬老人，这几十年中，常常行于前不巴村后不巴店、天苍苍野茫茫之境地，唉……

蓦然一想，会不会朋友从旁看我，压根把我自己活成了武侠小说中的人物？

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日 本文为《读金庸偶得》二〇二四新版序

新近发现的金庸给陈向平的两封信

陈晓东

据记载，1942年父亲随报社迁往福建南平，途中曾在浙江江山与金庸晤谈，此后金庸西行内地，暂断音讯。从这封挂号信可以看出，金庸直至1946年回到浙江后才和已到上海东南日报社工作的父亲恢复了书信联系，并在信中明确表达了到新闻界工作的意愿，恳请父亲给予帮助。

11月，经父亲推荐，金庸被杭州东南日报社录用，11月8日金庸函告父亲入职情况并表示致谢：

向平先生：买了车票当天就到杭州，已九时许，即宿清华旅馆，次日往报馆见陈生健兄，陪往见陈友琴先生，当承转交刘湘女先生，会谈后当蒙派为外勤记者兼收听外电工作，底薪五十元，约十日后略整行装，即往报到工作，事先当拟来沪一行。

此事介绍成功，感激无已，古人交友，相谢不贵乎言辞之诚，惟铭之中心而已，窃慕之矣。因恐悬念，特先告知，余当面谈，即祝

弟 良鏞谨上 十一、八

虽然金庸被派为外勤，但进入报社工作对他是一个重大的人生转折，而五年前在《东南日报》发表处女作的风华少年，此时竟已成为父亲的报社同仁。

重温父亲老人们的这段回忆，再细读当年金庸给父亲的这两封信和历经沧桑的《东南日报》副刊作者地址簿，感慨万千，欣慰莫名。

今年是金庸诞辰100周年。83年前的1941年9月4日，父亲陈向平在《东南日报》他主持的副刊“笔会”上发表了金庸的处女作《一事能狂便少年》，与当时只有高中二年级的金庸相识，而后成为忘年交。父亲不仅对金庸的文学起步和创作，而且对他从事新闻工作都提供了极为关键的帮助。

父亲陈向平，上海宝山人，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受党的委派入职东南日报社，主编副刊“笔会”，从事抗战文化工作。1942年8月父亲与报社一起撤往福建南平，1946年6月转到上海东南日报社任副总，继续主持副刊的编辑工作，建国后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副总编，负责古籍的编辑和出版，“文革”中遭受迫害，于1974年含冤离世。

